

大學通識教育與當代公民人文素養

— 哈貝馬斯對大學之診斷的意義反思

鄒川雄 *

南華大學

一、前言：大學在廢墟中？

本文¹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在「追求卓越」已成為今日流行語的年代，具有人文精神導向的通識教育如何成為重建大學理念的基石？本文將從當代著名思想家哈貝馬斯（J. Habermas）的大學觀點出發，探討大學在現代社會培育「新的公民人文素養」的可能性。²

今日的高等教育瀰漫「反人文主義」的氛圍，「追求卓越」、強調「績效主義」與訂立「評鑑指標」等，已成今日大學的普遍現象，這股教育「新保守主義」的浪潮已成為世界高等教育與大學發展的

*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副教授。

1 本文是作者關於大學理念與通識教育一系列研究的一個環節，關於作者過去這個主題的研究，可見鄒川雄（2006）。

2 本文所談的通識教育是指「具有人文精神導向的通識教育」，當然，通識教育精神並不完全等同於人文精神，事實上有許多通識教育的派別並不強調人文精神（如實用主義或進步主義的派別）。即使是強調人文精神的通識理論，其所指涉的人文精神的內涵，也有很大的差異。本文標舉「當代公民人文素養」，所指涉的「人文」是廣義的人文理念，是與功利、技術取向相對立的概念，相較傳統的古典人文理念，其涵義要更寬一些。

基調。³幾乎沒有人談論大學的「理念」了，取而代之的是「卓越」與「頂尖」，「效能」與「績效」。事實上，近年來有關高等教育的討論，「卓越」的論述（discourse about “excellence”）已取代「理念」的論述（discourse about “ideal”）。面對大學人文精神快速流失或消亡的情況，原有的通識教育或強調人文主義的陣營，似乎無法簡單地證成自身的價值。在今日的氛圍下，談論大學固有的人文主義精神，或是強調以人文精神為依歸的通識教育等，似乎已成為過時的玩意，是人文學者保守、反動且過時的堅持。

當代論述大學發展的重要學者雷丁斯（B. Readings）將其研究大學的專著，定名為《廢墟中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Ruins*），他以後現代主義的風格為今日大學定調：大學已經不再是「文化機構」（文化機構才需要理念），而是日益轉型為「追求卓越的公司」，大學已變成依賴市場機制的公司組織，學生已成為消費者，而非共同體中的成員。而所有大學成員所要強調的事物，就是「追求一流與卓越」，正如雷丁斯（2008）所言：

追求一流標誌着這樣一個事實：不再有大學的概念，或更確切地說，這個概念已失去了它所有的內容。作為完全屬於系統內部的沒有所指的價值單位，一流只不過標誌着技術的自我反映的時刻。系統所需的是投入運行，而且空洞無物的一流指的只是最大限度的信息輸入/輸出率。這也許不如我們一貫主張的那種大學角色崇高，雖然它確實解決了寄生問題。（頁37-38）

雷丁斯闡述了重要的觀點，為擺脫大學成為社會寄生蟲的指責，大學開始追求效能。結果是：大學「崇高」的理念與價值不再有意

3 關於教育的「新保守主義」浪潮，以及其強調的標準化測驗與評鑑模式，可見阿普爾（M. W. Apple）（2008）及哈格里夫斯（A. Hargreaves）（2007）之精闢分析。

義，取而代之的是遵循於系統管理的輸出 / 輸入的效能指令，越能百分之百完成這種指令者，我們稱之為「一流」或「卓越」。在此情況下，大學人文精神消亡了。

本文的基本觀點是，大學自始至終均不可能脫離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在過去是大學建立與發展的理念核心，在今日依然如此。這不必然是「保守反動」，反而可能「與時俱進」，甚至是「基進的」（radical）與「批判的」。質言之，本文依着哈貝馬斯對今日大學之診斷，所提出的是「新公民人文素養」的大學觀，這不僅有利於大學，也將有利於整個當代知識社會的發展。⁴

若是套用政治學立場的「左 / 右」光譜來分析，今日關於大學論述的右派立場（如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是將大學理念「管理學化」，大學應「追求卓越與績效」；另外一些大學論述的左派立場（如一些後結構、後現代主義者）則是將大學理念「虛無化」，那個充滿理念的大學行將滅亡，人已將其打上墓誌銘。從這兩種立場來看，資本主義最終都將在大學獲致勝利，大學從此再也不需要理念。只是「現代右派」在歌頌這種勝利，並且迎上前去，至於「後現代左派」，則認為大學無法抵抗此資本主義邏輯，只能哀嘆「大學已死」。面臨大學論述的左右夾擊，面臨追求卓越思潮的來勢洶洶，原有古典人文精神的支持者似乎招架不住，人文堡壘一個個棄守，剩下的只是為求績效的評鑑指標，以及為爭取來自國家或企業補助的林林總總的方案計劃。

本文的主要關注與問題意識在於，在此資本主義全球化及知識型態重大變化的時代，大學確實面臨前所未有的遽變，原有引以為傲的理念與人文精神，以及在大學中行之有年的種種原則（如學術自主），均面臨嚴厲挑戰。然而面對這種挑戰，我們是否只有以上的

4 筆者認為大學近年來興起的反人文主義與教育保守主義的趨勢，其實與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與知識結構面臨巨大變遷有關。

「現代右派」與「後現代左派」兩種選擇？是否一定要放棄「為大學找尋理念」的想法？人文精神在今日知識社會的大學，是否還有意義？

基本上，筆者十分贊成當代重要的知識社會學家德蘭迪（G. Delanty）的立場，他在《知識社會中的大學》一書，對今日大學的理念與使命，提出正面且積極的主張。他反對「大學已死」的想法，認為大學在知識社會應成為各種可能知識型態相互溝通交流的場所，藉以重新建立大學與社會之間的聯繫，並恢復學科之間的交流，以及大學與社會及國家之間的新互動關係（詳見德蘭迪，2010）。站在同樣的立場與關懷下，本文將引入當代社會理論大師哈貝馬斯對大學理念的精闢分析，並借助其中的啟發，以為今日探討大學理念、通識教育及其人文精神找尋合理的出路。⁵

二、哈貝馬斯觀點的引入： 系統 / 生活世界的二元模型、文藝公共領域

嚴格說來，哈貝馬斯並非是研究高等教育、大學課程或是通識教育理論的專家，⁶然而，基於以下的原因，我們仍將他的反省與觀點列為思索今日大學理念最重要的敲門磚。

哈貝馬斯是當今十分重要的哲學及社會思想家，他所精心構築的社會理論（以溝通行動理論為核心），已在當代學術界各個領域

5 本文主要從哈貝馬斯的觀點切入探討今日大學人文理念與通識教育的主軸，因篇幅所限，本文並未能處理與比較哈貝馬斯的想法與今日高等教育、大學發展，以及通識教育理論與實踐等相關研究的關係。

6 儘管哈貝馬斯不是高等教育的專家，但是運用他的理論來研究高等教育或大學課程者，比比皆是。例如霍華德（C. C. Howard）的《通識教育理論》（*Theories of General Education*）一書，就大量運用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來探討通識教育。見Howard（1992）。

（如社會學、哲學、政治學、文學、傳播、教育、美學、法律等）產生廣泛的影響。其早期的「公共領域」觀點，以及後來提出著名的「系統/生活世界」的二元式理解架構，也成為許多學科觀察社會現象及自我理解的極為有用的視角，尤其哈貝馬斯對大學議題也十分關注，他曾有一篇重要演講：「大學理念：學習的歷程」，是本研究的基礎文獻。⁷這篇演講是當代西方學術界探討大學理念非常重要的文獻。據本文的研究，筆者甚至認為，這篇演講最終將成為今日捍衛通識教育理念與大學人文精神的經典作品。

哈貝馬斯為診斷與批判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出著名的「系統/生活世界」模型（Habermas, 1987），這個模型是今日診斷大學的當代發展，並反省大學可能的定位與出路十分有用的理論觀點。⁸所謂「系統」（system）與「生活世界」（lifeworld）可以視為看待社會的兩種方式（就方法論而言）；也可以指涉現代社會的兩種運作原理（就社會存有學而言）。當我們把社會看成是由工具理性或功能理性所形成相互連結的網絡時，社會就是自主的「系統」，此時生活世界成為其背景因素而存在（或者用系統理論的語言，生活世界是系統的環境）；另一方面，當我們把社會看成是行動者依據規範、價值與意義而相互溝通與相互理解地連結在一起時，社會就是具整體性意義的

7 哈貝馬斯並非對高等教育及大學理念漠不關心。事實上，他從學術生涯的早期就十分關注這個議題，曾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寫過幾篇文章討論大學生抗議與大學民主化的議題（哈貝馬斯，2004）。七十年代以後，哈貝馬斯專心建構他的溝通理論，確實已很少著墨高等教育的議題（這段期間，高等教育開始面臨巨大變化）。然而，1986年在海德堡大學（Re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建校六百週年的典禮上，哈貝馬斯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講：「大學理念：學習的歷程」（Habermas, 1989, pp. 100–127）。這是迄今為止，他對於大學理念最深入分析及最重要的作品。

8 事實上，前面所提的德蘭迪，在其討論今日大學可能的出路時，所提出的在公共領域中「技術公民身份」（technological citizenship）與「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的重要區分（德蘭迪，2010，頁184–191），乃是哈貝馬斯「系統/生活世界」二元化模型的一種成功的運用。

「生活世界」，此時系統成為其背景因素。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最主要的系統是現代國家所組成的「行政系統」，以及以市場和資本競爭為主的「經濟系統」；至於生活世界，則包含三個相互關聯的要素：「文化」、「社會」與「個人」。從演化的觀點來看，現代社會不但系統與生活世界之間日益分離，系統自身也日益分化及複雜化；另外生活世界亦日益理性化。

這種「系統/生活世界」二元化社會模型讓人複雜而動態地掌握現實社會的運作狀態（包括今日的大學）。假若只將社會視為系統，則完全忽略社會本然具有的規範與價值的向度（也就是人文精神的向度），並且抹煞一切理想或理念在社會中運行的意義，「應然」完全化約為「實然」，一切只是冷酷的現實利益計算，以及合乎功能運作的行動適應（正如同今日大學在「追求卓越」口號下所做的那樣）。尤其更重要的是，理念從屬於生活世界，在系統的觀點下，大學理念與人文精神當然要被打入冷宮，英雄無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假若純粹只將社會視為生活世界，則社會將成為自我透明的價值世界，所有的社會事物都回歸行動者的意義世界來理解，如此一來，將忽略超越個體之上的組織、制度與功能運作的社會真實狀況，「實然」被化約為「應然」，這樣做會誇大理念在制度運行中的作用（正如許多傳統保守主義者所提倡的那樣）。獨尊系統可能會「冷酷無情」，現實至上，因而斬斷理論的「批判與解放」的向度；獨鍾生活世界則可能會「不切實際」，忽視現實社會的複雜性，最終變成虛幻的理想主義。因此，同時掌握大學的系統面向與生活世界面向，才能釐清今日大學運作之關鍵所在，這也是哈貝馬斯對大學診斷的出發點。

除了系統/生活世界的二元觀點之外，哈貝馬斯早期關於「公共領域」的研究，對本文也有重大的啟發。哈貝馬斯在早期的重要研究

《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追溯西方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出現，特別區別「文藝的公共領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與「政治的公共領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嚴格說來，政治的公共領域才是真正的公共領域，但是，文藝的公共領域卻是政治的公共領域之所以存在的文化基礎。換言之，公民討論的公共領域，必須立基於一群受過教育且具有文化涵養的公民，而文藝公共領域（如沙龍、咖啡屋、雜誌刊物的意見交流等）正是培育這些有教養的公民的養成場所。

哈貝馬斯這種觀點極為獨特，也深具啟發性，⁹引發人思考，假若早期以少數資產階級為主的公共領域，其運作需要一個文藝公共領域作為這些資產階級的文化養成所；那麼今日已是屬於大多數人均可參與的公共領域，其有效運作是否更需要一個屬於平民大眾的文藝公共領域？而晚近已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普及教育的大學，是否可能承擔這樣的功能？順着哈貝馬斯的觀點，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是，今日的大學是否可以承擔這樣的重要意義——作為現代公民參與到「公共領域」的公民文化養成所？這是否正是今日大學「通識教育」所可能擔負的重要使命，也是復興人文精神的重要契機？

如果這樣的討論方向是正確的話，那麼本研究可能產生另一重附加價值，就是不僅僅探討大學理念的人文精神，點出大學通識教育的實踐意義，而在於其真正完成了哈貝馬斯社會批判理論中具有解放實踐意涵的核心環節（儘管哈貝馬斯並未清楚闡明這個環節）。本文後來將會證明，大學以通識教育為核心的現代公民養成教育，其實可以作為當代批判理論的具體實踐最重要的策略。

9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在後來的理論發展，哈貝馬斯似乎不再處理此問題，這形成了令人遺憾的「空缺」。一直到此文章出來，似乎乍現曙光，哈貝馬斯似在這裏補充了此空缺。關於這一點，本文第五節「回歸文藝公共領域：通識教育可以彌補哈貝馬斯批判理論的可能空缺？」將會詳細討論。

為了深刻理解哈貝馬斯如何詮釋他的大學觀，我們有必要跟着他的思路及他的「大學本質上從屬於生活世界」這個基本主張，探究古典大學理念及其人文精神，以便展開大學本質與通識教育可能的出路的討論。

三、德國古典大學理念：從生活世界的觀點

在「大學理念」一文中，哈貝馬斯主要從德國古典大學理念的反思開始。此大學理念其實承襲德國觀念論的傳統而來，¹⁰強調「理念是制度機構之靈魂」。大學要執行其理念及使命，必須與大學成員自身的目標、動機或行動意義相互連結起來。也就是說，大學必須定位在理想化的、具典範意義的生活形式之上。由此可以看出，大學理念必須是個「規範性」的概念，意即生活世界的概念，是來自生活世界，也必須回到生活世界中去。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以降的德國大學傳統，正是以大學理念來構思投射出這種理想的生活形式。¹¹

10 這個黑格爾（Hegel）的傳統有其看待「制度」與「理念」關係的獨特觀點，即將一般制度機構視為「客觀精神的表現形式」（forms of objective spirit）。大學作為社會的制度機構，當然也是一種客觀精神的形式。正如哈貝馬斯所言：

只有當其內在的精神理念能夠活生生地展現出來時，制度機構本身才能保持運作。一旦精神離開了機構，它將會僵固成一種純粹機械性的存在，正如沒有靈魂的有機體最終將質變為死去的東西一樣。……大學理念意指某些形成性的原則（the formative principles），根據這些原則，所有客觀精神的形式被建構出來。（Habermas, 1989, p. 101；此為筆者自譯，後同。）

11 當然，按哈貝馬斯的觀點，雅思貝斯（K. Jaspers）等人仍然將大學理念與大學組織綁在一起思考，然而韋伯（M. Weber）的研究早已告訴我們，在高度分化的現代社會中，組織的目標與功能是與成員個體動機相互分離的，而且正是這種分離才造就出組織的效能，其具體結果就是「組織已不再具體展現出理念」（organizations no longer embody ideas）（Habermas, 1989, p.102）。二次大戰後的半個世紀以來，隨着高等教育的擴張，大學要保持雅思貝斯（甚至洪堡特）所構想的具規範性意義的大學理念幾乎已不可能。在這個新的社會的條件下，堅持大學理念是否還有意義？這正是本文主要關懷所在。

首先，哈貝馬斯認為，有兩個重要的觀念連結到德國大學的理念：「學術的自主性」及「文化國家的理想」。所謂學術自主，是指現代科學與學術活動應從教會束縛中解放出來，而且應該制度性地不會遭受國家或經濟活動的影響。所謂文化國家（Kulturstaat）則是指：我們保障大學的自主性及其學術研究的無限制的自由，理由在於大學所建立的自由的學術體系，其整體化的力量，其實最終會符合國家自身的利益。換言之，研究的內在動能，以及對「未被窮盡、而且永遠無法窮盡」（陳洪捷，2006，頁57）¹²之事物的揭露，均能夠在大學學術中被保留或創造出來，如此，國家民族的整體精神生活與道德文化，將會集中於大學之中，此乃「文化國家」的真正意涵。

（一）四個核心理念：學術、自由、孤寂與教養

學術自主與文化國家的具體內涵是甚麼？哈貝馬斯回到德文 Wissenschaft（學術）這個字義的討論。Wissenschaft有極為豐富的意涵，在英文或法文中並沒有對應的字，此字不同於英文的science，而是指一種廣義的學術研究活動。正如哈貝馬斯所言的，作為這種學術意涵的大學理念，會特別着重兩個面向：

一方面會強調學術的自主性（autonomy），這種自主性只能在「孤寂」（solitude）與「自由」（freedom）的狀態中才能產生出來，因而必須與布爾喬亞（bourgeoisie）的社會及政治的公共領域保持一定的距離。另一方面，這種大學理念會強調學術本身具有通識的文化形塑的力量（the general culture-shaping power），以便使得生活世界的總體能夠集中於反思的形式。

12 此乃洪堡特的著名用語，用來說明德國的大學對於科學及學術研究的基本看法，亦即科學乃未完成之事物，或者說是對未完成事物的永恆追尋。

……這樣的學術，可以想像為哲學性的基礎科學（a philosophical fundamental science）。（Habermas, 1989, pp.109–110）

在這裏可看出德國的大學理念一些極為重要的精髓。德國古典大學的核心概念一般可以歸納為四個：「科學（學術）」、「自由」、「寂寞（孤寂）」、「修養（教養）」。¹³上述兩段引文已將這些重要的核心概念展現出來。接下來通過哈貝馬斯的觀點來檢視這四個核心概念。

首先，就「科學或學術」（Wissenschaft）而言，大學中的科學就是「哲學性的基礎科學」，本來就具有「整體性」（totality）意涵，不可能單單注意某一專業的進展（如今日的科學）而忽視其文化社會的總體意義，亦即，（用哈貝馬斯的語言來說明）這種哲學性的基礎科學研究不可能單獨強調其功能自主性，而忽略了背後生活世界的根基。

其次，就「自由」而言，大學中科學或學術的「自由」，主要是指科學研究應有獨立於國家及社會指令的自由，亦即儘管科學研究經費來自國家的支持，但是學術研究卻必須免於國家的干預。唯有如此，學術自由的益處，最終才有利於整個國家與社會；同樣地，儘管社會（尤其是政治及經濟領域）對於學術研究的成果及運用會感到興趣，但是學術研究也必須獨立自主，免受這些社會力量的影響。大學的學術自由，實際上是生活世界保護其自身獲得自主與自由的制度性措施。

第三，就「寂寞」或「孤寂」而言，大學的學術研究，基本上是沒有工具或功利目的的「理性沉思活動」，需要免於外界干擾的沉靜悠閒的學術氛圍，這是包含師生在內的研究者所應培養的學術情操與「內在的精神自由」。唯有在寂寞或孤寂的狀態，具有創造力的學術創造才能展開。在這裏，可以看見德國大學理念中的重要精神元素。

13 這說法主要取材自當代中國研究德國大學理念很重要的學者陳洪捷的見解。見陳洪捷（2006，頁57）。

由此也可以明瞭哈貝馬斯所指出的，為甚麼學術研究必須對職業教育的直接功利的要求採取防衛心態，以及為甚麼要對布爾喬亞社會的經濟及政治事務保持相當的距離。由於大學本質上屬於生活世界，強調大學的「孤寂」，消極面是保護及淨化生活世界，積極面則促進及深化生活世界自身的反思力量。

第四，就「修養」或「教養」(Bildung)而言，大學的學術研究有一重大意義，就是提升個人與民族的整體教養(修養)。由於受到新人文主義的影響，德國古典大學一直強調大學與個性的養成及個人的發展應相互連結起來，在這裏，教養是與啟蒙思想所強調的功利主義觀點相對立的。儘管哈貝馬斯並沒有直接提及這個核心概念，然而他所指出的「通識文化形塑的力量」其背後所指涉的正是教養的觀念。哈貝馬斯把生活世界的議題帶進德國古典大學的討論，並把對總體生活世界進行反思視為大學理念的一環，這是教養概念的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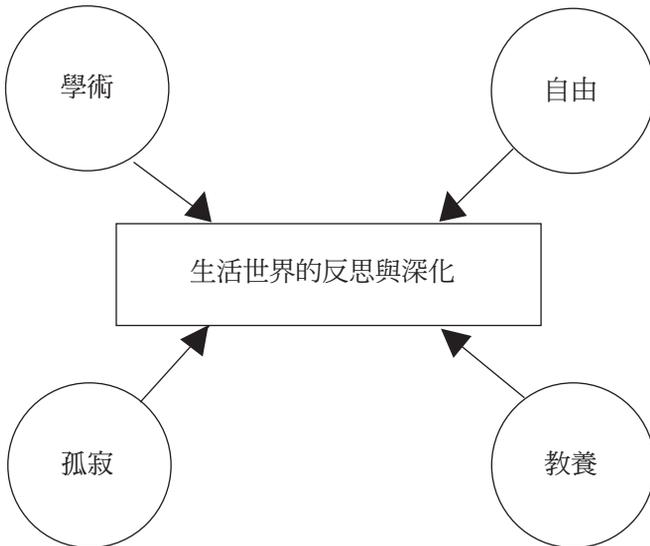


圖1 生活世界的反思與深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德國古典大學的核心理念——學術、自由、孤寂與教養，基本上正是立基於生活世界，並對生活世界進行反思與深化的制度性設計理念。

（二）大學理念下的四個統一原則

由於把Wissenschaft這個重要概念綜合性地理解成「哲學性的基礎科學」，哈貝馬斯認為德國大學理念會開展出四個統一原則：1. 教學與研究的統一，2. 各學科之間的統一，3. 學術與通識教育的統一，4. 學術與啟蒙之間的統一。過去一百多年來，這四個統一原則成為大學最重要的制度設計準則，而其背後預設了生活世界的自身統一（文化、社會與個人的統一）。

接下來，順着哈貝馬斯的思路來分析及詮釋這四個重要的統一原則。

首先，洪堡特等人所設想的科學研究歷程，基本上要求教學與研究的統一，通常意味着：教與學皆參與科學創造與進步的過程，科學研究歷程與教學歷程（及學習歷程）兩者是合而為一的。¹⁴ 科學研究歷程涉及文化的創新，教學歷程則涉及文化的傳遞與再製（reproduction），兩者均為生活世界重要的一面。透過研究與教學的統一，其實規範了這兩個層面均向對方開放，文化創新與文化傳遞處於反饋的關係，有利於生活世界的深化，也讓學術不會脫離生活世界，另外也讓學術的後繼者自我再製出來。

第二，德國大學理念的主張是：由於「哲學式的基礎科學」是百科全書式地建構起來的，以及由於哲學本身就把自己展現為整體文化的反思形式，在此前提下，就保證了各個學科之間的統一，保證

14 正如哈貝馬斯所言，「學術能夠再製其自身，是以教授能夠培育自己的繼承者為其附帶條件。」大學從事研究教學工作與為大學培育未來的研究者，這兩者根本而言是相互配合的。見Habermas（1989, p. 111）。

了對科學與藝術的批評，以及科學與法律道德之間的統一；這反映各價值領域分化後（此乃生活世界理性化的必然發展），仍然可以在生活世界中統一起來。

第三，Wissenschaft這個字較為整體性的理解，也將保證「學術研究的歷程」與「人獲致通識教育的歷程」，兩者之間是統一的。由於「哲學式的基礎科學」具有綜合整合的意涵，因此學術不只是進行真理的認知與探索，還必須將認知者的倫理性格納入其中；不只是知識的增長，更是自我的開展與提升。通識教育的重要目標就在於，讓我們能從任何的單向性或偏狹性思維中解放出來。正如哈貝馬斯所言：

這種朝向絕對的提升歷程，將打開個體性全面發展的道路。因為這種學術具有包容的特性，在成為理性的科學養成所的同時，也將成為通識教育的場所（Habermas, 1989, p. 110）。¹⁵

因此學術與通識是教育的統一，事實上是生活世界中「文化向度」與「個人向度」之間的交融，在這裏，「文化傳統的傳承與創新」與「大學生個體人格形塑及社會化」相互統一起來，這是生活世界理性化或是溝通理性展現的一種形式。

第四，最後，也許（就哈貝馬斯而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則。由於所有的科學建構均立基於「反思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reflection），這就允諾了第四原則「學術與啟蒙之間的統一」。此原則

15 當然，學術與通識教育的統一，在哈貝馬斯看來也必須具備許多條件。例如，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將與傳統的方式不同，教師並非為了學生而存在，學生也非為了教師而存在，而是兩者均是為了學術而存在。簡而言之，教師與學生並不是上下的教學關係，而是一種平等與互補的合作關係。哈貝馬斯高度推崇研討課的討論型態（the discursive forms of the seminar），認為平等互動的關係只有在這種討論中，才能真正地實現（Habermas, 1989, p. 112）。

賦予大學具有引領社會、服務社會的重大責任，是生活世界反思改革與批判動能的泉源。因為站在生活世界的立場，學術從生活世界中產生，應在反思及批判中再度回到生活世界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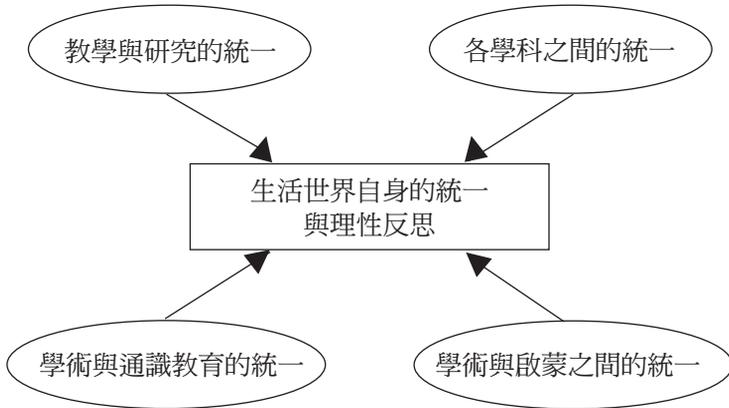


圖2 生活世界自身的統一與理性反思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總結如下，古典大學所營造出來的四個統一原則，事實上是立基於生活世界自身統一的大原則，正如圖2所示。而這四個原則也都是為促進生活世界的深化與理性反思能力，而所進行的大學制度設計。

（三）古典大學理念的崩解與今日大學的「系統化」

當然，以上都是從生活世界觀點出發所作的分析，並非事情的全貌。哈貝馬斯從來沒有認為這些古典大學理念完全正確，事實上，他明確主張，德國古典大學的理念，在其十九世紀提出之時，就具有空想的成分。他認為這些德國大學根本的理念與原則的實際運用，有其制度上的條件；而這些前題條件，一是在開始時已經缺乏，即使當時已經具備，也在經歷一個多世紀的變化後，其實現的可能性愈來愈低。

接下來將探討這些條件在這套大學理念建立一百多年以來，在歷史時空的變化，以及闡明到了今日這些古典大學理念所面臨的崩解危機。用哈貝馬斯的觀點來看，這段時間最重要的變化乃是：大學愈來愈加「系統化」了！亦即「系統」的力量愈來愈壯大，使得主要立基於生活的古典大學理念，愈來愈站不住腳，最終土崩瓦解。

哈貝馬斯從不同層面檢討大學在這段歷史的變化。首先，一個世紀以來，隨着系統的壯大，人日益進入高度專業分化的經濟職業體系，這個體系會要求更多的專業學科訓練，這就使得各專業學院（如技術學院、商業學院、教育學院、傳播學院或藝術學院）如雨後春筍，大量佔據高等教育的市場，想把這些學院通通排除在大學門外，已經不可能。然而這些具有職業與功利取向的專業學院進入大學，勢必改變大學原來追求學術研究的本質，尤其會與前面所言的德國古典大學之理念與原則（尤其是「自由」、「教養」與「孤寂」），產生激烈衝突。

第二個層面是，這一百多年來，各個經驗科學（包含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幾乎均已從其孕育的哲學母體中脫離出來，各自發展成獨立的學科。每個學科均建立起自身的研究邏輯與程序合理的方法論，這就使得原先德國大學理想中無所不包的「哲學性的基礎科學」，以及具有百科全書精神的哲學理想，面臨瓦解的命運。這種哲學的瓦解，表示Wissenschaft這個概念的古典意涵將消失殆盡，也意味建基德國大學理念的四大核心概念——學術、自由、教養與孤寂——面臨質變與瓦解。¹⁶

16 正如哈貝馬斯的觀察，學科分化後的每門科學，其內在動力就像脫韁野馬般自我發展起來。由於僅僅表面上遵從新人文主義的教養原則，自然科學各學科很快就獨立出來，社會科學也跟進。尤其是實證主義模型對各門學科（甚至是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學科）而言，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及成效。見Habermas（1989, p. 113）。

第三個層面是，隨着資本主義的深化與科學不斷的發展，科學與資本主義的生產之間產生緊密的連結，因而科學自身變成了工業社會重要的生產力與推進器。以往自然科學還一定程度扮演提供世界觀的角色，目前已完全為了產生技術上有用的知識（technically usable knowledge）而努力。事實上，經歷百來年的演變，大學中所有機構從事研究的前提條件，大多是來自於經濟系統或行政系統的功能指令，而很少是為了提供生活世界的通識教育的需要。¹⁷從我們的立場來看，正是在此趨勢下，今日「追求卓越」取代了具有人文精神的大學理念，把大學「管理學化」終於成為今日大學的核心追求。

四、關於當代大學本質與現實的討論

（一）大學本質上較多從屬於生活世界

前面的論述可以小結如下：通過「系統 / 生活世界」二元模型，哈貝馬斯考察了大學理念的本質，他認為早期德國古典大學的核心理念如學術自主、自由、孤寂與通識文化教養等等，基本上均是從生活世界產生出來的；至於基於核心理念所產生的四個統一原則（教學與研究的統一、各學科之間的統一、學術與通識教育的統一、學術與

¹⁷ 除此之外，哈貝馬斯還提及第四個層面：百年來的發展證明，德國（其他國家亦雷同）的學院教育「建基於上層的文人公務員，並界定了有教養的布爾喬亞的社會階層地位。」不論在德國或是其他西方國家，大眾教育是與學院教育區別開來的，代表職業分化的建立，以及對不同階級結構的確認。重要的是，哈貝馬斯認為，這代表大學理念中「普遍主義」的內涵是虛偽的，而其允諾的大學作為社會整體解放的實驗場，本身就是個謊言。這點也通常成為當代左派及後現代主義者對大學最重要的批判。例如研究高等教育階層化的重要學者布爾迪厄（Bourdieu）就很有力地指出，透過文化資本，大學早已成為中上階級複製其下一代的經濟、社會與文化位置的重要教育機制，簡言之，大學已成為階級再製（reproduction）的競技場。因此，所謂大學理念，不過只是掩飾其階級再製利益的一套意識型態罷了！見Habermas（1989, p. 114）。

啟蒙之間的統一等)也是為了生活世界自身的反思性與深化而產生的制度設計原則。因此大學理念本質上從屬於生活世界。當然一個世紀以來,隨着資本主義系統的日益壯大、大學裏的專業學院紛紛設立、經驗性學科一一獨立自主發展,以及科學技術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連結更加緊密等,都促使大學問題更加複雜化,大學理念普遍遭受質疑,大學人文精神也面臨重大危機。

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問題與病徵在於系統侵入生活世界,使得原本屬於生活世界的事物必須按照系統的邏輯來運作,因而造成「生活世界被殖民化」(the 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結果就是人在生活世界的「文化傳統的喪失」、「意義的喪失(虛無)」、「脫序」、「異化」、「疏離」與「精神疾病」等。而這樣的情況正發生在今日的大學。哈貝馬斯一直提及,一個世紀以來大學中「系統的力量不斷漲大,而生活世界的領域不斷縮小」的事實。他指出:整個學術體系依賴於經濟與行政系統的功能操控指令,愈來愈多,而依賴於師生心靈交流所達成的理念整合,卻愈來愈少;¹⁸他也斷言:以往大學自主性是規範性意義的自主,即大學學術自由不受外界(如教會、國家或社會)的干擾,如今的大學自主性,卻是大學與經濟—軍事—工業複合體整合起來的功能自主性(Habermas, 1989, p. 106)。

近年來大學盲目地「追求卓越、績效主義、評鑑指標」等,不正是系統侵入生活世界的表現嗎?然而哈貝馬斯卻強調,儘管學科分化與遵從系統功能自主的發展,一直是大學發展的基本趨勢,但說

18 哈貝馬斯在這裏引入了柏森斯(T. Parsons)「教育革命」(educational revolution)的觀點。事實上,自1945年以後,幾乎所有的西方工業國家及社會主義國家均大量擴張教育的規模。高等教育也進入學術體系分化的新階段——已變得愈來愈功能自主了。

到底，大學就本質而言仍然較多從屬於生活世界。¹⁹也就是說，大學特有的理念與人文精神，就是它與生活世界生死與共的基本成分，不應消失，也不可能消失。²⁰假若它真的消失，那將是大學自身的扭曲與災難。

（二）當代大學的現實：網紮多重職能的複合體

在「系統/生活世界」模型的參照下，哈貝馬斯十分清醒地認清大學同時在兩個面向扮演重要角色。他為今日知識時代的大學創用了新的術語——「網紮多重職能」（a bundling of functions）、「內在分化的複合體」（the internally differentiated complex）。

在這個大學機構的屋頂下，有許多不同的職能傳統地網紮在一起，因而我們可以察覺：在大學中獲取科學知識的歷程不僅僅和

19 德蘭迪基本上也認同哈貝馬斯的看法，認定大學的本質較多地屬於生活世界而非系統。他說：

我相信，儘管面對專業化和理性化的現實，伽達默爾和哈貝馬斯的觀點總有一些合理的理由，大學與生活世界的聯繫仍然多於它與金錢和官僚權力政治領域的聯繫。在那樣的範圍談論大學理念仍然是有意義的。但是必須避免將這種「理念」看做是一種文化原則的總和，最重要的，大學的理念並不一定要出自大學本身。就像哈貝馬斯所宣稱的，一種「新的活力只有在大學的圍牆之外才能被大學的理念吸收」。（德蘭迪，2010，頁85）

20 持平而論，哈貝馬斯並不反對某些系統論者的主張（或者說系統的觀點有時也有些優勢），因為在現今的知識社會，為處理高度複雜的情境，自主的功能次系統早已成形而且專業化，這些專業學科早就為其功能指令服務，而不會連結到生活世界之上。因此，「大學理念作為理念與制度的整合力量，基本上是無法掌握社會的複雜性的」（Habermas, 1989, p. 120）。但是話鋒一轉，哈貝馬斯立刻指出系統論的問題，在於完全忽略了大學絕不僅僅執行功能系統的操控指令，還立基於廣大的生活世界，承接文化領域的各種使命與任務。這些職能完全不能被化約成功能系統的指令。

專業技術發展及職業準備相互交織在一起，而且也與通識教育、文化傳遞，以及公共政治領域的啟蒙相互交織在一起，這對於學術研究本身而言，可能具有核心的重要性。(Habermas, 1989, p. 107)

由這段引文可以得知，儘管哈貝馬斯沒有明說，他顯然接受了當代大學研究的著名學者克爾 (C. Kerr) 的重要觀點：即今日的大學是「多元綜合大學」(multiversity) (克爾，2009，頁1-41)，包含許許多多不同的組織、機構與團體，並執行超乎想像的多元職能。只是克爾並不關心這些多元紛雜的職能到底應該歸諸於系統的指令要求，還是來自生活世界的呼喚。但對於哈貝馬斯，這卻是最重要的事，尤其關注那些無法超脫於生活世界之外的。²¹因為從哈貝馬斯的觀點看來，唯有回歸生活世界的視域，才能尋回大學的人文理念。

到底大學今日擔負了哪些多元而紛雜的職能呢？哈貝馬斯在此引入了柏森斯的觀點來討論，說道：

柏森斯假定高等教育系統同時履行四種職能：(a) 最核心的職能：從事研究工作，以及培育新生代的科學家及學者；同時一方面要進行 (b) 職業的培訓準備 (以及生產技術上有用的知識)；另一方面要進行 (c) 通識教育的工作，以及 (d) 致力於文化的自我理解與心智的啟蒙。(Habermas, 1989, p. 121)

21 原文是：「大學是個網繁多重職能的機構，其所履行的很多職能是絕對無法像資本主義企業或跨國代理人那樣，超脫生活世界的視野之外的。」(Habermas, 1989, p. 120)

這裏所談的四大職能，正是哈貝馬斯說的那些被相互網紮在一起的大學職能。²²哈貝馬斯認為，在美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前三個職能可以對應三個不同的大學機構：研究生學院（the graduate school）、專業學院（the professional school）及大學部本科學院（the colleges）。他認為，唯有第四個職能沒有自己的制度載體，這個職能（文化啟蒙）的實現，乃是透過作為知識分子角色的教授來完成的。然而本文卻認為，這第四個職能也應收攝入大學的通識教育的制度設計之中。也就是「文化理解與心智的啟蒙」是師生共同的志業，而非單單屬於教授的使命。

由此可以看出，大學所承擔的林林總總的職能（功能）中，那些屬於生活世界，讓生活世界可以再製其自身者，至少有超過一半以上[依筆者的看法，前述的四大職能中，至少（c）與（d）的職能完全屬於生活世界，（a）與（b）的職能中，也有部分屬於或立基於生活世界]，正是因為這些無法化約為系統指令的職能的存在，哈貝馬斯才能夠大膽的宣稱：大學理念不會完全死亡！這正是哈貝馬斯主張今日大學乃是「網紮多重職能」這一主要現實的原因。

（三）大學人文理念展現在高度人為設計的學術性學習歷程

假若那些不可化約到系統的職能可以讓生活世界在大學中再製其自身，當要如何運作呢？正如哈貝馬斯所言：

大學透過通識薰陶的社會化過程、文化的傳遞，以及透過社會整合所達致的意志形成等歷程，生活世界乃能再製其自身，

22 基本上哈貝馬斯幾乎完全接受柏森斯這種大學四大功能的觀點。當然，他立即將這四個職能與德國大學理念中所標舉的四個統一（教學與研究的統一、各學科之間的統一、學術與通識教育的統一、學術與啟蒙之間的統一）相互參照，見 Habermas（1989, pp. 121-122）。

這些歷程只有在高度人為設計的學術性學習歷程的情境才有可能實現出來，而這學習歷程是為了獲取知識而設計出來。只要這種複合體沒有被完全撕裂破壞，則大學的理念將不會完全死亡。（Habermas, 1989, pp. 107-108）

事實上，哈貝馬斯認為，在大學場域中生活世界自我再製的歷程，是在一套「高度人為設計」的學習歷程中完成的。這個學習歷程令人充滿興趣，儘管哈貝馬斯沒有明確說明，但從文意看來，它幾乎指涉到與人文精神相關，有組織、有規劃的「大學課程安排」，尤其是指通識教育的課程安排，當然，這裏也應涵括學院的生活安排在內。

當然，學習歷程不僅僅在生活世界，也在系統的領域中展開，甚至是在這兩個領域的交疊地帶展開，如哈貝馬斯所言：

在大學中所發生的學習歷程，不僅僅進入與經濟或行政管理系統的交換關係之中，而且也立足於生活世界自我再製的內在關聯之中；這個學習歷程已超越了為職業作準備，而擴張至如下的情景：透過學術思維方式的訓練而致力於通識的社會化歷程；已超越了生產出專家知識，而達到這樣的情況：透過具體議題有益的政治性討論而致力於心智的啟蒙；已超越了對基本議題與方法問題之反思，一方面能夠透過人文學科對傳統的詮釋來延續與發展傳統；另一方面，也能夠通過科學、道德、藝術與文學理論的反思，致力於對整體文化中各學科的自我理解。正是大學中學術學習歷程的組織化，這才使得各分化的專門學科，在大學履行各種職能的同時，能被深深地植入在生活世界之中，生根茁壯。（Habermas, 1989, p. 122）

這段語言有其重大的意義與價值，可以作為哈貝馬斯對於今日大學理念與定位所作的最具雄辯的說明。首先，哈貝馬斯堅持，大學的職責必然會超越經濟或行政系統所給出的功能指令，這不是理想上，而是實際如此。許多系統論者把大學想的太簡單了，而非太複雜了。事實上，那些超越系統的職責，如人格形塑、通識教育、心智啟蒙、文化傳統延續，以及學科的文化自我理解與定位等等，這些都是與大學息息相關的人文精神使命，也是今日大學想抹去卻無法抹去的重責大任，許多新保守主義者顯然忽略了這個顛撲不破的真實。

其次，哈貝馬斯高度評價大學這個有組織的學習歷程，此歷程可讓各學科自身紮根於生活世界。學科之建立本來不一定為了服務於系統，事實上，學科作為一種世界觀，它的觀點、方法與論證模式，有助於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促進生活世界與文化的自我反思，為文化創造新的意義與價值。這一見解十分有趣，這讓我們認識到：哈貝馬斯對大學的理念其實是與他的德國老前輩的大學理想——「學術可提升個體與民族的文化與教養」——是一脈相承的。當然，要讓學科的學習具有「文化教養」的功能，那麼學科的學習就必須從屬於通識教育的人文精神，而非完全禁錮在專業科系的自我再製，或是封閉於職業系統的功能要求之中。

然而，如果大學具有立基於生活世界的職能，為甚麼這些職能具有重大價值？為甚麼在「網紮多重職能」的大學，這些看似紛雜的職能卻能夠維持「統一性」（儘管這早已不是德國古典大學意義下的「統一性」）而不會讓大學瓦解？為甚麼各個學科帶來的生活世界的反思，具有價值？其他機構或組織難道無法提供這些職能嗎？大學與這些組織相比，又有何種優勢呢？

（四）大學的獨特優勢：學術論辯的溝通形式

依哈貝馬斯的觀點，大學真正的優勢在於其獨特的溝通交流形式：「學術論辯的溝通形式」（the communicative forms of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argumentation）。

我認真地相信，分析到最後，正是學術論辯的溝通形式把大學各種職能的學習歷程相互結合在一起。……學術研究者，無論工作如何孤單，其學習歷程無可避免會鑲嵌在公共溝通的學者社群之中。因為同心協力追尋真理的事業會立基於公共論辯的基礎，從來不僅僅成為自我調節次系統的操控媒介。甚至在學者社群中所獲得的聲望，也不例外。（Habermas, 1989, p. 124）

這種「學術論辯的溝通形式」推崇一種反覆討論、相互詰問的推論式論辯（discursive debate），基本上能對知識的發展產生刺激與積極的作用，這對於生活世界的深化與反思有重大意義，因為會促使我們對於「令人驚訝的論證」（the surprising argument）事先就給予應有的關注。也就是說，在學術論辯的場合，

不論任何時刻，任何新觀點均可能產生，而新的觀念會不預期中地出現，這樣的大門會一直開啟！（Habermas, 1989, p.125）

這種令人訝異、非常規、不按傳統模式展現的觀點或意見，若按照系統功能指令的要求，早在形成階段就被排除掉了，然而在大學的學術論辯形式中，卻被保留下來。在此我們看見大學「基進」性格的一面，某程度而言，這不僅僅得到保留甚至鼓勵，只要最終能夠以

「最佳論證力量」的形式被學術社群所接受。²³

在哈貝馬斯看來，這種「學術論辯的溝通形式」乃是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的重要特質，也是大學真正優勢之所在。學術論辯的溝通形式，說到底乃是發揚哈貝馬斯所謂「無扭曲溝通」與「論辯倫理」的一種優質的表現形式。透過這種形式，真理被安置在學者社群生活世界的公共共識之上。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大學的科學研究，表面上是由國家或企業提供資源，因而被劃歸成為行政或經濟子系統服務的科學事業，自始至終都不只是贊助者與被委託者之間的私下關係，而是一種公共事業——正如康德所言「理性的公共使用」（the public use of reason）的事業。²⁴質言之，科學的本質具有公共性。學者在其研究社群中所獲致的聲望，正是他長期以來在其社群中發揮理性溝通與論辯精神，靠最佳論證而獲致的公眾權威，需要來自學者生活世界的認可與共識。哈貝馬斯認為，大學的學科體制²⁵及學習歷程，不論是演講課、研討課、師生的交流活動或是研究團隊的學術合作等，均具有公共的性質。

由於大學這種學術論辯的溝通形式具有公共性，使得大學在今日

23 正如博蘭尼（M. Polanyi）在論述知識或文化的創新時所提出的，創新的本質就是能夠「出乎意料之外的令人信服」（the convincing surprise）。見Polanyi（1962, pp. 116-117）。

24 康德（I. Kant）曾在〈論何謂啟蒙〉一文，作出「理性的公共使用」與「理性的私下使用」的著名區分。依照康德的說法，我們若是遵守機構或組織的命令，即便這個機構是政府公共機關，我們仍然是在實行理性的私下使用；唯有我們以學者身份，面對世界所作出的普遍的理性判斷，這才是理性的公共使用。這也是哈貝馬斯公共領域中的理性概念。關於理性的公共使用與啟蒙之間關係的討論，見施密特（J. Schmidt）（2005）所編《啟蒙運動與現代性》一書。

25 大學的學科建置，依然具有公共性。以哈貝馬斯的觀點言之，每個學科的建立與發展，也與生活世界息息相關，事實上，學科建置化就是建立關於此學科之學者社群的「專業化的內在公共領域」（specialized internal public sphere），唯有在此內在公共領域的理性溝通與論辯中，也就是，遵循「學術論辯的溝通形式」，此學科才能蓬勃發展。在大學中，這些建置化的學科既分化獨立又相互聯合交織在一起。見Habermas（1989, p. 124）。

社會中具有優勢，這當然不是指大學作為服務於系統生產力的優勢（如大學被認為是知識經濟的火車頭），而是指大學作為溝通理性與生活世界理性化的優勢。此優勢展現在論辯形式本身所具備的「平等主義」（egalitarian）與「普遍主義」（universalistic）內涵，這些都是內在於溝通理性，也是理想化的公共領域的前提。

由以上的分析，得知哈貝馬斯的大學理念的真正意義在於：在當前知識經濟時代，系統功能理性與工具理性高度擴張，進而威脅以溝通理性為基礎的生活世界存續的情況下，大學具有保護生活世界免受傷害，以及進而更新生活世界的重要使命，大學應參與到公共領域中去，並成為形塑公共領域中公共性的重要基地。

五、回歸文藝公共領域： 通識教育可以彌補哈貝馬斯批判理論的可能空缺？

哈貝馬斯的系統 / 生活世界二元式理解架構，由於其廣度與深度，使人可以立基其上，進而對於今日的大學理念有綜合性的理解。正如在前面一般，藉由哈貝馬斯，可讓人實質超越「新保守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對大學的見解和主張，在大學發展的方向、原則及對大學的基本診斷方面，得到極為豐富的認識與深刻的洞察。

然而接着要問的是：這個理論是否能夠引發大學具體的實踐策略？這套抽象分析是否能讓人更具體地理解今日的大學處境？轉換成更具體的問題是：假若大學內那些以大學之名而相互網綁的多重職能，其中有許多是屬於生活世界而應視作延續大學理念的地方，那麼，這些職能有哪些是我們應該特別關注的？假若生活世界的延續與革新是今日大學的重要使命，那麼，哪些大學的職能特別重要？如何去履行這種職能？最後要問的是：如果大學可以成為培育公共

領域公共性的重要基地，那麼，這種公共性的培養所指涉的是甚麼？大學要如何參與到公共領域中去，才能真正發揮大學的優勢而產生作用？

以上這些問題均不好回答，也超出了哈貝馬斯在1986年海德堡大學這篇演講文章的內容範圍。在這裏，我們將回到前面（本文第二節）所提及的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概念找尋線索。公共領域基本上是一套制度設計，它指涉位於國家權力體系之外的溝通與資訊交流的場域，基本旨趣在於透過對公共事務的討論（discourse）與論辯（debates），形成民意，以便影響政府決策及監督公共事務。

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中，哈貝馬斯追溯西方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誕生及變遷的歷史過程，他在此有一極為重要的論點，就是「文藝公共領域」與「政治公共領域」的區分。他認為在資產階級公共領域邁入成熟健全之際，有一歷史前提必須先行滿足，就是必先有健全、可以培育出「個體性」的私人領域作為前提條件。在資產階級興起的歷史中，那些從布爾喬亞親密領域（家庭）中誕生的個體，在「擁有財產」及「受過教育」這兩個前提下，他們走出家庭，進入沙龍、咖啡屋、各式宴會、文藝社團，音樂會、畫展、劇院，以及發行報刊、雜誌等，他們發表自己的意見，展演自己的內心世界，與他人共享、交流及討論，在這裏他們創造了閱聽的公眾世界，因而形成了「文藝公共領域」。²⁶正如哈貝馬斯所言：

26 如哈貝馬斯所言

在公域中作為公眾彼此相關的，是私人身份的人們。公眾對於理性之公共地運用的理解，尤其受到了從夫婦家庭的親密領域（intimsphere）中產生出來的面對聽眾讀者（publikumsbezogen）的主體性這種私人經驗的影響。從歷史上說，那種親密領域，是水乳交融、隨意自在（a saturated and free interiority）這種現代意義上的私人性（privateness）的來源。（哈貝馬斯，1999，頁153）

當公域還沒有在國家/社會關係這個充滿張力的領域中明確履行政治功能的時候，產生於夫婦家庭的親密領域中的主體性也可以說已經創造了自己的公眾。甚至在公共權力對公域的支配受到私人身份的人們就政治問題進行批判性論證的挑戰，最後被它奪過去之前，在這種主體性的名義之下就已經產生非政治形式的公域——在政治領域發生作用的公域的以文學形式出現的為先導。它提供的是一種仍關注自身的批判性公共反思——一種私人身份的人們關注其新穎私人性的本真體驗的自我澄清過程——的訓練基礎。（哈貝馬斯，1999，頁153）

在這段極為重要且複雜的陳述中，哈貝馬斯要表達的是：人在公共領域的理性論辯的心智與表達能力（即康德所言的「理性的公共使用」），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必須建立在後天的培育之上。「文藝公共領域」在歷史上，就曾擔負起這個任務。首先個體能夠在家庭私人領域培養個體性，並通過與他人內心的交流，達成對自身體驗的自我澄清，其次在文藝性的互動交流中，培育批判性思考與表達的能力，這正是培育了「理性之公共使用」的素養，而為真正的政治公共領域做好了準備。

哈貝馬斯早期探討公共領域時，提出了這個重要的主張：公共領域的「理性公共使用」的素養，必須先在具有個體精神的文藝公共領域中培養。換言之，健全的公共性必須以健全的個體性為條件。平心而論，這是十分獨特且具有啟發性的觀點，然而十分令人不解的是，晚期哈貝馬斯似乎不再討論這個議題，事實上，哈貝馬斯後來所建構的普遍語用學（溝通能力理論）、生活世界的理性化、理想的言談情境、商談倫理學、審議民主等，若要能在社會中實現出來，則絕對需要有類似「文藝公共領域」那樣的公民人文素養的養成所。

只是，這個養成所到底在哪裏？哈貝馬斯並未給出答案，留下這個「空缺」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²⁷

其實在海德堡大學這篇演講中，哈貝馬斯已經碰觸到這個問題。但只是觸及，卻未能真正展開討論。在本章的最後，我們將以哈貝馬斯的基本理念作為引導，來將這塊遺憾的「空缺」彌補起來。而「邁向大學通識教育作為公民人文素養的訓練所」，似乎就是合理的答案。

六、以大學通識教育作為邁向公民人文素養的養成所

（一）文藝公共領域的制度性條件

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中，哈貝馬斯討論到「文藝的公共領域」時，除了提及其作用與歷史發展外，還特別說明以制度設計來說，有三個獨特的制度性標準：第一，所有參與公共領域的行動者，討論及發言都一律平等，而不會考慮每人的地位或身份。換言之，要讓「最佳論證力量」獲勝；第二，公共領域所關注的議題，將會是那些「一直未被社會質疑的但至今成為問題」的議題。也就是說，

27 正如當代中國研究哈貝馬斯很重要的學者童世駿的正確質問：

如果說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前期，政治公共領域中的「批判性公共反思」，或者如康德所說的「作為學者在讀者界的全部公眾面前所能做的那種運用理性」，是因為「文學公共領域」中對於人性、主體性和理性的培養才有可能的話，那麼，在[二十]世紀末、[廿一]世紀初，在文學公共領域因為大眾文化氾濫、核心家庭破碎而扭曲、甚至解體的情況下，有甚麼東西可以代替文學公共領域來培養人們的交往理性能力，以便能像前面所說的女性主義者那樣，積極有效地參與政治交往？換句話說，恰恰在於對公共領域的內在批判成為現實的時候，這種內在批判的可能性——批判所需要的主體性和公共性的培養——卻似乎成了問題。（童世駿，2008，頁140）

本文的立場與童世駿相同。

公共領域將會處理社會原先被視為理所當然、或是被禁止討論的禁忌問題；第三，公共領域是開放的討論文化，原則上永遠知道自身處在一更大、包容更多的公眾群體中，而非封閉於小群體中（哈貝馬斯，1999，頁162–164）。

上述三個文藝公共領域的制度性標準，在歷史上對形塑當時的公民人文素養發揮極大的作用，也間接促成政治公共領域的出現。本文認為，這三個制度標準，在今日依然可以具體展現於大學教育，尤其是大學的通識教育，因而促成大學通識教育可以成為形塑公民人文素養的基地。²⁸

二十世紀的人經歷了柏森斯所言「教育革命」，教育擴張已成為世界現象。大學教育已從原先的精英教育（佔15%以下），經過大眾教育（15%–45%），而向普及教育（45%以上）邁進。教育革命的結果，就是社會大多數人均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財產之有無，已不構成進入大學的重要條件。到了廿一世紀，在歐美先進國家，大多數的種族、族群、性別與階級的群體，幾乎均能進入大學。所謂「受過教育的人」或「有教養的人」（an educated man）幾乎可以代表所有的人。這個現象代表「平民式公共領域」（plebeian public sphere）在大學中實現的條件日益成熟。²⁹亦即，大學中的討論文化，其實背後指向更大、更包容，涵蓋更多元文化的閱聽公眾。

28 在早期資本主義時代，受限於歷史條件，其開創的文藝公共領域，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然而今日的大學卻以更能滿足這三個制度性條件，以至於形塑公民人文素養的功效，可能更勝往日的文藝公共領域。當然，在系統片面擴張與壯大的情境下，大學作為公民人文素養的養成所，也可能完全被系統指令及專業掛帥所侵佔，因而喪失其應有的職能。由此可知，大學（及其通識教育）作為教育場所，本身就是系統與生活世界之間相互爭奪的戰場，端賴行動者的選擇。

29 當然，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與普及化，並未改變教育階層化的基本現實，事實上，今日大學之間的階層化仍然十分嚴重，人人均能上大學並不表示每個人在大學中所享有的資源、聲望及服務是平等的。關於在各大學之間如何建立平等溝通互動的「大學內部的公共領域」，是極為重要的議題，筆者再於未來另文探討。

（二）通識教育與公民人文素養

公共領域中所謂「依賴最佳論證力量」的準則，其實與大學最基本的溝通形式——學術論辯的溝通形式——有異曲同工之妙。換言之，通過溝通論辯，讓最佳論證力量贏得勝利，既是公共領域，也是大學中的基本規則。³⁰我們甚至可以這樣假定：在大學中的學術訓練（包括各學科的方法訓練）可以成為進入公共領域的推論訓練與討論素養的先修班。

當然，要求學術訓練成為這樣的先修班，是有先決條件的。細部而言，大學的「通識教育」相較「專業科系」，要更佳接近公共領域與生活世界的基本要求。因為大多數的專業科系，儘管在形式上仍需循學術論辯的溝通形式，但在外在系統強大力量的指引下，以及在學科自主性的要求下，其原本具有的生活世界的人文精神容易向「技術應用要求」轉化，其知識的公共性質容易向學科自身的「封閉性」轉化。因此，假若大學的通識教育十分堅強挺立，就能在大學多元紛雜的職能中，發揮貫穿、統整與平衡的作用，促使所有大學場域的學術活動均浸染人文化成的精神；相反地，假若通識教育在大學淹沒不彰，則這些專業學科將會與系統聯合，如脫韁野馬，最終生活世界在大學裏全面遭受系統殖民及肆虐；或者造成學科的公共性下降，成為學科自身內部封閉性的自我再製，形成學科的私有化。

以上這兩種情況（「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與「學科的私有化」）在最近大學走向績效主義及管理主義的要求下，更加愈益明顯。因此，通識教育及其內含的人文精神必須貫穿於大學之中，使其成為大學課程與生活安排的核心，成為公民人文素養的養成中心，也就是成為

30 事實上，大學的論辯式的溝通形式，一直是大學與其他機構不一樣的地方。其他機構的知識創造，大都以委託人或資源提供者的利益為依歸，他們大都只是服從系統的指令或市場的需要。唯有大學還保留着生活世界與公共領域的基本理想要求：依賴的是最佳論證力量，而非效率或利益。

晚期資本主義的文藝公共領域的中心，這一點乃是重建大學理念最重要的一步。質言之，這樣的制度設計不僅是今日高等教育高唱「追求卓越」的趨勢下，維持大學理念的真正堡壘，更是保障生活世界自主發展及學科具備公共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如表1所示，從哈貝馬斯的想法出發可以有如下的建構：以通識教育為核心的公民人文素養的養成中心，其可提供的學院課程與學院生活的內涵，可以依據前述大學的四大職能作分析。

表1 大學的四大職能與公民人文素養的關聯

大學的職能	與公民人文素養的關聯
一、學術研究與培育未來的科學與學術人才	1. 培育學生具備論辯式的推論、思考及表達的方式，作為公民素養的重要根基 2. 生活世界引導的學術研究
二、職業的培訓及就業準備	1. 培育進入職場所需的基礎共通能力：如溝通表達的能力、與他人合作協調的能力 2. 作為技術公民，把職業專業應用到社會生活的反思，如專業倫理
三、通識的社會化歷程	1. 文化傳統的傳承、汲取與創新 2. 校園團體生活、書院生活及人際互動學習 3. 各種文化創造與精神交往之活動
四、文化理解與心智啟蒙	1. 各學科知識的文化定位與反思 2. 對大學內外的心智啟蒙

從表1的內容可見，這些與公民人文素養相關的訓練與陶成，在大學並非只落在狹義的通識課程或文化啟蒙的職能上，也應擴展到學術研究及職業準備這兩個職能，簡言之，廣義的通識人文精神應落實在大學各個多元紛雜的領域。這正足以顯示，公民人文素養雖立基於生活世界，但仍然深深地嵌入系統與專業運作的活動（此即「專業與通識的融通」），也唯有如此，系統與生活世界在大學才能成為有機的統一體，而非互不相干的。

正如哈貝馬斯在分析公共領域的發展時，把文藝公共領域所培育的「個體性」（舊的公民人文素養）視為後來政治性公共領域之「公共性」的文化基礎，今日以通識教育為核心的大學的生活與學習模式，也將成為這個知識時代培育豐富多元且健全之「個體性」（新的公民人文素養）的搖籃，因而成為社會具備公共性的基礎。這個「個體性」包括：精緻的語言文字表達訓練、文化傳統的詮釋與反思、與他人溝通的說服力與理性推論，對自己內在需要、利益與信念原則的理解與表達能力，以及進而同理地理解他人需要、利益與信念的能力、與他人合作與協調之能力、獨立思考與批判的自主態度。另外，大學裏集體住宿的書院式生活，通常也是培育學生公共生活的重要場所，若能根據生活世界的精神，有意識地設計與規劃（而非只是系統式、功能式的宿舍管理），可讓學生潛移默化的發揚個體性，以及培育團隊精神與道德情操，以期真正達成公民人文素養的提升，培育具備審議民主精神的現代公民。

（三）從公民人文主義到基進人文主義

最後，以通識教育為核心，作為公民人文素養的基地的大學，將不只是保守地守護着生活世界及人文精神，保守地維持系統與生活世界的平衡，還可以有更基進、解放與創新的意義。亦即：大學可以

成為吸收大學之外的社會重要議題、社會異議、邊緣論述、激進觀點、弱勢意見，以及革新進步的各項主張建議的匯集、發散與傳送的中心；或者說，一個非主流、基進及解放觀點的發聲與反思的中心。

早期的公共領域當然也具備這樣的解放意涵，如哈貝馬斯所研究的，當時主流的觀點主要來自教會及國家的律定，而解放的聲音常常出自市場及受過教育的少數布爾喬亞知識分子。今日的公共領域則有很大的不同，今日主流的聲音常常來自強勢的經濟與行政系統、企業老闆及政黨領袖，至於解放的聲音則常常從社會的邊緣團體，尤其是從大學及其外圍組織產生出來。正是在這裏，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有了新的連結方式。

哈貝馬斯在他後期的重要著作《在事實與規範之間》，曾就今日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連結，作了發人深省的著名論證：

公共領域的溝通結構與私人生活領域連結的方式，是透過賦予公民——社會一種相對於政治中心的外圍地位，而能在察覺辨識新問題時，有更高的感受優勢。晚近數十年來的重要議題可作為這種論點的證據。舉例而言，試想不斷攀升的核武競賽；試想原子能的和平用途，或其他大規模科技計[劃]和基因工程等科學實驗中所牽涉的風險；試想過度擴張的環境所牽涉到的生態威脅（酸雨、水污染、物種滅絕等）；試想第三世界戲劇性的貧困狀況和世界經濟秩序等問題；或試想諸如女性主義、移民攀升這類議題；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相關的問題。這些主題幾乎最初都不是由國家機器、大型組織或功能系統所提出，相反地，它們都是由知識分子、憂心的公民、基進的專家、自稱為「提倡者」的人士等諸如此類的人們率先開始討論。由最遙遠的外圍向內移動，這些議題強行開啟了通往報紙、利益社團、俱樂部、

專業組織、學術界與大專院校的道路。在催化社會運動和新的次文化的發展前，它們尋覓論壇、公民創制權和其他的平台伸展手腳。社會運動和新的次文化能夠帶來戲劇化的貢獻，極有成效地彰顯這些議題，並促使大眾媒體報導這些事件。唯有透過它們在媒體中引發爭議，這類主題才能觸及更廣大的群眾，並因此在「公共議題」中[佔]有一席之地。有時，在一個議題能夠透過邊緣的候選人或基進政黨令人跌破眼鏡的選舉、「既存」政黨擴展政治綱領、重要的法庭裁決等管道，擠身核心政治系統並獲得重視前，必須要獲得轟動社會、群眾抗議和持續的運動所支持。（轉引自漢密爾頓、湯森，2007，頁170-171，或見哈貝馬斯，2003，頁470-471）

漢密爾頓（P. Hamilton）和湯森（K. Thompson）將此稱為公共領域的「閘門模型」（sluice-gate model）。³¹我們認為，這個閘門模型對於本章的討論深具啟發意義。公共領域好像閘門，是所有重要議題、基進議題從外圍或邊陲進入中心的匯聚之地，爾後才能形成公共議題，進而影響決策。

正是在此閘門模型中，我們看見了大學及其通識教育在當代的定位。亦即：大學可以成為公共領域此閘門最重要的入口，成為反省社會重大議題、吸收社會異議與邊緣弱勢觀點的入口。正如前面所言，大學基於自身的自主性，當然不可能成為當代政治公共領域的一部分，但卻可以透過通識教育以人文精神為導向的各種文化與學術活動（如學術研究、課程論壇、研討課程、文藝交流、學院生活、住宿學習等），堅定地成為當代文藝公共領域最重要的環節。更重要

31 關於此閘門模型之討論，見漢密爾頓、湯森（2007）第三章第六節的討論。

的，這個環節可以成為社會各項議題（尤其不為資本主義主流價值所接受的議題或批判性觀點），從邊緣到中心，匯入公共領域的重要入口。也就是大學自身成為開門的入口，而身處於此入口的大學學習者，也在各項通識導向的學術文化活動中，培育自己成為具有公民人文素養的大學知識分子。

這種「作為公共領域開門入口」的大學通識教育，將成為具備解放精神的「基進人文主義」（the radical humanism）或是「人文基進主義」（the humanistic radicalism）。筆者認為，這將是廿一世紀大學理念、通識教育與人文精神可能的出路。其具體的「高度人為的學習歷程」設計如下：

第一，議題引入大學入口：大學師生透過通識教育的制度設計與課程安排（如論壇、講座或其他學術文化活動），將社會中各種可能的批判性、外圍或邊緣的議題觀點引入大學的討論，讓這些議題與主流議題的觀點相互照面並進行對話。

第二，批判性對話：當這些批判性論述被引進大學殿堂時，將進入大學學術論辯的溝通領域，正如哈貝馬斯所言，由於學術論辯基本上容許甚至鼓勵「令人驚訝的論證」出現，因而必然會衝擊大學主流知識及學科傳統原有的規範及疆界，進而引發學術界（包括師生）共同的對話與反思。事實上，當有爭議的論述被放入大學課堂或學術討論時，就會激起新的對話與論辯，這包括主流與非主流之間、學科與學科之間、理論與實踐之間，以及學術與生活世界之間的對話，這些對話將會有利於生活世界的自我反思與深化。

第三，社會參與及實踐：為了深入這些未被主流價值關注的基進性或邊緣性議題，大學應以通識教育課程為舞台，設計實踐性的或服務性的課程，讓師生參與這些基進/邊緣事務的真實實踐脈絡中，進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中，再將反思的經驗帶回課堂的學術討論。

第四，師生形塑批判性的人文素養：通過「議題引入」、「批判性對話」以及「參與實踐」三個環節，基進議題將以學術論辯的溝通形式重新加以改造，得以進入公共領域；另一方面，大學師生也因而形塑出基進性與批判性的人文素養。

以上的學習歷程設計，儘管只能作概略性的描述，³²然而透過這個歷程，通識教育自此將成為「基進的人文主義」的舞台：在這裏，合乎哈貝馬斯批判精神的「大學新人文主義」正式誕生；舊保守主義的古典人文精神找到了新的論述形式；新保守主義的「卓越論述」與「管理論述」獲得有效的控制與平衡，系統與技術無限上綱的弊害也得到反省與批判；帶有較為相對主義色彩的後現代主義，以及激進色彩的多元文化論，也獲致融入與對話的空間。這是當代大學理念與人文精神的真正意義與依歸之所在。

七、結語

本研究從一個問題出發：在今日追求卓越與績效的大學趨勢下，通識教育是否可以承擔重建大學的人文理念的責任？本文以哈貝馬斯對大學的思考，貫穿整個研究的軸線，以他的系統/生活世界二元模型及文藝公共領域的理論作為理論視角，以其〈大學理念〉作為分析的起點，最終得出結論：大學通識教育可以成為今日公民人文素養的養成所。

以下我們將這個結論概略總結說明如下：

第一、今日的大學處境是：當考慮到當代資本主義系統對大學的

32 這個歷程所提及的「基進邊緣議題引入」、「批判性的對話」、「社會參與與實踐」三部曲，最終養成「批判性的人文素養」。基本上這是個複雜且多層次的課程設計模式，限於篇幅，有待將來另文討論。

作用，就會知道古典的大學理念已經過時；然而若只考慮系統的作用時，大學自身將遭到嚴重扭曲。在此兩難中，本文主張大學本質上較多地從屬於生活世界，視大學為綑紮多元職能的複合體，其中有許多基本職能不能化約為系統的一部分，在這裏大學與生活世界生死與共。其次，認清大學依賴高度人為設計的學習歷程以再製生活世界，也認清大學真正的獨特性與優勢在於其學術論辯的溝通形式，這促使大學與生活世界緊密相連，也讓大學具備公共性，因而成為參與公共領域的重要基礎。

第二、由於今日大學有可能滿足文藝公共領域產生的制度性領域，大學通識教育將可成為邁向公民人文素養的養成所。這個想法可彌補哈貝馬斯理論發展的一個可能的空缺，而此人文素養可在大學四大職能中發生作用，關鍵條件在於通識教育的人文精神要能貫穿於大學。

第三、通識教育的公民人文素養不能只是保守主義的防衛姿態，而必須成為社會基進或邊緣議題進入公共領域開門的入口，如此一來，公民人文主義將轉變成基進人文主義。透過議題引入、批判對話、社會實踐及批判性素養的建立，大學通識教育將成為基進人文主義的舞台，在這裏，大學理念與人文精神找到了真正的當代意義。

本文只是初步的嘗試，有許多部分未能清楚交代。例如，今日大學的反人文主義的保守主義趨勢與當代資本主義結構變遷的關聯；哈貝馬斯的觀點與今日大學及通識教育理論之間可能的對話（「德國式的大學理念論述」如何與「美國式的通識教育理論」相互連結起來？）；各大學之間如何建立平等溝通互動的「大學內部的公共領域」；基進人文主義導向之課程設計的具體模式等等，這些議題均十分重要，只因篇幅限制，無法在本文中詳細討論，有待未來進一步討論及發掘。

參考書目

- 克爾（著），楊雅婷（譯）（2009）。《大學的功用》。台北：韋伯文化國際。
- 阿普爾（著），黃忠敬（譯）（2008）。《教育的「正確」之路——市場、標準、上帝和不平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哈貝馬斯（著），童世駿（譯）（1999）。〈公域的結構性變化〉。載於鄧正來、亞歷山大（編），《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頁121-172）。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哈貝馬斯（著），童世駿（譯）（2003）。《在事實與規範之間——關於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哈貝馬斯（著），郭官義、李黎（譯）（2004）。《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哈格里夫斯（著），熊建輝等（譯）（2007）。《知識社會中的教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施密特（著），徐向東、盧華萍（譯）（2005）。《啟蒙運動與現代性：十八世紀與二十世紀的對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陳洪捷（2006）。《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童世駿（2008）。〈公與私：劃界問題的歸屬問題〉。載於黃俊傑（編），《公私領域新探：東亞與西方觀點之比較》（頁133-143）。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雷丁斯（著），郭軍、陳毅平、何衛華、周利娟（譯）（2008）。《廢墟中的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鄒川雄（2006）。《通識教育與經典詮釋：一個教育社會學的反省》。

台南：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漢密爾頓、湯森（著），葉欣怡（譯）（2007）。《社會學大有用》。

台北：群學出版社。

德蘭迪（著），黃建如（譯）（2010）。《知識社會中的大學》。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Habermas, J.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homas McCarthy, Trans.). Boston, MA: The MIT Press.

Habermas, J. (1989). *The new conservatism : 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S. W. Nichol森, Ed. & Trans.).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Howard, C. C. (1992). *Theories of general education*.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Polanyi, M. (1962).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